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建构

朱琳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张爱玲作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活跃的女作家，她笔下的女性有着独有的时代印记和悲剧特色，本文从解构男性权威和剖白女性自身两个方面入手考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建构，也看到了张爱玲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不仅揭露出女性生活的艰辛、受到的压迫，更对女性自身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体现出其作为女性作家的敏锐判断与人性思考。

关键词：男权；女性建构；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的女性建构是建立在五四女性大发现基础上的，几千年来，女性被隐藏在历史的地表之下：她们失去姓名，只有职能，作为女、母、妻、媳等形象存在；她们失去性别内涵，只有形象，作为女性的性别被物化为一种形象的能指；她们被规定为从属客体，一生都在“从父兄，从夫，从子”。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¹一直到五四时期，人们在发现“人”的时候，也发现了女性，女性这才走到了大众面前。但是正像许多作家们早已关注到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经敏锐发现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旧交融时代的女性始终无法真正获得与男性一样的身份地位，她们要么重回家庭寻求庇佑，要么成为都市商品交易的一员，女性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多的努力。而张爱玲从解构男性权威和剖白女性自身两个方面入手建构出女性形象，正展现出新旧交融过渡的宗法社会里，女性挣扎其中的艰难和苦闷，从而对男权至上的文化传统所制造压迫歧视以及父权宗法社会戕害人性、泯灭人欲的恶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揭示更是一直到今天依旧值得我们去反思叩问的。

一、解构男性权威

解构男性权威是张爱玲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进行的重要一步，为此，她采取了双重手段，包括正面上的消解父权，以及反面上的塑造女性大家长，也就是发现封建大家庭中父权的失职和寻找替代者这两方面来进行解构男性权威。

(一) 消解父权

张爱玲对于父权的消解显示在许多小说的文本中，她采取了塑造自私、荒唐的父亲，无能、猥琐的丈夫，消失的男性话语等方式来对封建父权进行消解。

1. 自私，荒唐的父亲

《心经》中许峰仪是荒唐、自私到了极点的父亲。作为父亲，许峰仪无视人伦，沉溺于欲望快感，竟然悄悄和自己的女儿暧昧了七、八年之久。在玩弄女儿的感情之后，许峰仪为了逃避这样乱伦的感情，选择包养与女儿年龄相仿的天真、纯洁的女孩子，并以“健康、正

¹ 孟悦，戴锦华著.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7.第 25 页。

常”的爱为借口抛弃女儿，毫无父亲的担当。

《花凋》中的郑先生正如张爱玲写的那样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²，是一位同样典型荒唐而又自私的父亲。他不承认民国，自居名士，对待孩子，他的态度是：“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³对生养孩子这回事没有丝毫的责任心。作为父亲，郑先生在女儿生病奄奄一息时，不愿意给女儿花钱买药，认为把钱花在药上太冤；但是当女儿去世以后，却愿意花钱加工修葺女儿的坟墓，在墓前花钱雕刻天使、撰刻碑文。郑先生的确是一个在孩子生病时不愿意出钱，宁愿花钱买鸡鸭水果，有钱只愿先花在自己身上的自私父亲。

《创世纪》中的匡霆谷、匡仰彝这一对父子也是彻头彻尾的自私父亲，他们是一对冤家对头，只因为“印彝恨他父亲用了他母亲的钱，父亲又疑心母亲背地里给儿子钱花。”⁴父子都在算计戚紫薇的钱。当戚紫薇抱怨家里没钱时，匡仰彝想到的办法却是让自己两个大一点的女儿去做舞女，没有一丝一毫父亲的担当。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也是一位自私的父亲，他很明白他那些美丽的女儿的价值，很是洋洋自得地称自己的漂亮女儿为“琉璃瓦”。因此，他对于女儿们的婚姻，在选女婿方面也是颇有计划，往往选中的不是高官，就是富商。但当他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后，从女儿出嫁中无法获利，更是眼看着女儿打定主意嫁给贫穷的人家，他竟然被气的生了一场大病，更是对妻子说出“以后你再给我添女儿，养一个我淹死一个。”⁵这般狠毒的话。

千百年来，父亲作为父权宗法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一般都是家庭的统治者，承担着家庭的重担，是勇敢、伟岸，作为家中子女的成长榜样。可张爱玲笔下的这些自私荒唐到了极点的父亲，揭开了父权宗法社会中对于父亲形象笼罩的虚伪面纱，打破了父亲神话，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中对父亲的歌颂，更是消解了父亲在封建家庭中的作用。

2. 无能，猥琐的丈夫

在张爱玲的笔下除了对父亲形象的消解，还有对丈夫形象的消解。在封建社会中，夫权对女性的影响或将延续女性的一生。丈夫这一角色要求妻子“以夫为天”，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他们是女性的主宰者、引领者、救赎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他们无能又猥琐，不仅失去了主体地位，更是失去了离开女性之后的生存能力，失去了起码的尊严。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乔琪乔就是典型的无能的丈夫，他是个“除了玩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的花花公子，自己没有能力赚钱，也不受家庭的重视，因而只能靠着和有钱女人的调情过活。他明白自己没有钱，又过惯了富裕生活，自认是“招驸马”的命，打定主意要找一个阔小姐。梁太太劝说他结婚时用的借口也是，他可以等葛薇龙不能赚钱养家时离婚。婚后，他也主动出让作为丈夫的尊严和权威，搬到梁太太的别墅中，平常也是依靠妻子挣钱养家，通过妻子的卖淫来供养自己尽情玩乐。

如《创世纪》中的匡霆谷，他更是一个丧失了丈夫权威的无能猥琐的男人。父亲去世，他和妻子回家奔丧，却在还差七里到家的时候往外跑着嫖赌；他的职位是妻子问娘家哥哥托情要来的北京小官，妻子逼他辞官搬往上海他也照做不误；他害怕自己的妻子，一辈子靠妻子卖田卖房，买卖股票外汇养活整个家庭，到了晚年还要靠妻子变卖衣饰来维持家庭的周转；他不仅不承担丈夫的责任赚钱养家，还要因为儿子常常花钱来仇视敌对他，可以说完全丧失

²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35页。

³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35页。

⁴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239页。

⁵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18页。

了丈夫的权威。

《年青的时候》中沁西亚的丈夫同样是一个无能的丈夫，在结婚时，通过潘汝良的口吻可以知道他是个酒徒，而且是个被女人宠坏的男人，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出息。在婚后依旧和妻子住在妻子的娘家里，家中钱不够用，依旧需要沁西亚找兼职贴补家用。

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本该沉稳，承担家庭重任的“丈夫们”大多因没有经济能力，失去权势而处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他们被剥夺了象征夫权身份的能力，他们成为了家庭的无用者，因此也由封建家庭的主体地位变为了从属地位，甚至更加边缘。

3. 文本中消失的男性话语

还有一些男性，虽然也作为父亲，丈夫们在文本中出现，但是形同虚设，他们被遗忘在故事中，成为文本中消失的男性话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豫琨，关于留下葛薇龙这件事，梁太太生怕被他骂诱拐良家女子，但在小说中葛豫琨却未成为葛薇龙留在香港的阻力。他只是短暂的出现，随后就彻底销声匿迹，而他所代表的父权也被转移到了梁太太手里。还有《金锁记》中的姜二爷，他虽然是曹七巧的丈夫，长白、长安的父亲，但也只是仅仅出现在文本中一下，就变成了墙上挂着的一张遗像。而且他身上所代表的权力也被剥夺了，父权被转移到曹七巧的身上，夫权被转移到姜老太太和姜家族人那里。这些男性虽然也在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但是他们却在文本中失去了话语权，成为了故事中的隐形者，可有可无的人物。

张爱玲通过一位位自私荒唐，无能猥琐父亲，丈夫角色的塑造，打碎了封建社会为男性塑造的神圣光环，将男性的丑恶赤裸裸的摊开在阳光之下。同时，通过文本中消失的男性话语，使读者发现：封建家庭中的男性边缘化并不影响故事的进展，从而进一步消解掉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作用。

（二）塑造女性大家长

在张爱玲笔下，作为父亲，丈夫的男性无能，猥琐，没有担当，无法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因此女性大家长便顺势而为的出现，接手了封建大家庭的一切权力，成为一家之主。

关于女性大家长的创作缘由，或可追溯至《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多次在文中表示自己甚爱《红楼梦》，并曾在14岁时创作过《摩登红楼梦》一书。张爱玲笔下也有一批类似《红楼梦》中贾母这样的封建大家长的形象，诸如《创世纪》里的戚紫薇，《倾城之恋》里的白老太太，《金锁记》里的姜老太太等。戚紫薇在匡家执掌经济大权，为丈夫谋划职位，决定家中的搬家大事，儿子没有赚钱能力，也只能每日从母亲紫薇哪里拿私房钱供自己取乐，儿媳更是在这样一位婆婆的隐形下没有丝毫的存在感，成了整天围着厨房转悠的太太。而白老太太也是在白家凝聚核心的大家长，她卖一次田能够全家吃用两年；在宝络相亲时她能够搜集全家的金珠细软，甚至连三房姑娘收到的生日礼物也能被拿来给宝络做旗袍，这也可以看出白老太太在家中的绝对地位。更不用提《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姜家的院墙仿佛隔开了时间，院内还是清朝，姜公馆中仍遵循着旧时的规矩，儿子，女儿和儿媳都要在晨起请安，伺候她吃早饭，姜家的子孙们的重要任务也是要哄姜老太太开心，孝敬她。姜老太太的话俨然圣旨一般，每一位儿孙都得遵循，而在她死后，姜家也自然而然的要分家。可以说，姜老太太是姜家的核心，凝聚着整个姜家。

张爱玲在进行全方位的解构男权时，一方面从消解父权入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塑造女性大家长出来代替男性行使父权，将男性原本牢牢掌控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挪到女性大家长的身上，失去权力的男性权威，也自然而然的被消解掉了。

二、剖白女性自身

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的剖白则是建构女性形象的更为重要的部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将女性在封建家族中受到的压迫，女性自身的精神缺陷，女性在现代都市社会中面临的窘迫处境表现了出来，塑造出了更加全面立体的女性形象。

（一）寻找被封建家族压抑的女性

正如孟悦、戴锦华关注到的那样“女性因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社会之外，她周围那一道道由父、夫、子及亲属网络构成的人墙，将她与整个社会生活严格阻绝，使她在人身、名分及心灵上，都是家庭——父、夫、子世代同盟的万劫不复的囚徒。”⁶封建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到了女性这里则更为严格，代代相传的宗法礼教深深束缚着女性的身心，在宗法礼教社会中，女性正常的欲望必须被层层压抑，成为端庄的贤妻良母，成为圣坛上的烈女贞妇，女性须得抹除掉自我的差异性，留下令人称颂的伟大母性，温柔妻德，只有这样的女性才是其他女性的榜样。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受到层层压抑：哥哥做主将妹妹曹七巧嫁给一个官宦人家的瘫痪少爷，打定主意要攀上一门有钱的亲戚。而姜家仿佛宫廷一般井井有条的秩序也是压抑曹七巧的重要源头：从小说开头丫鬟们的口中就能看出，曹七巧虽然嫁进了姜家，但是她的出身就决定了她在家中的地位，甚至连伺候的丫鬟也处处看不上她，认为她这样的身份只配做个姨太太。更别提那些出身公侯官宦家庭的妯娌们了，更是个个都将曹七巧当做一个笑话看，拿她的日常行事做派逗笑取乐。而姜老太太也看不上自己的这个儿媳，时常指派给她差使，零零碎碎地给她罪受，可以说曹七巧在姜家的处境就是孤立无援，处处受压制。曹七巧在婆家饱受欺负，而当她想把满腔的委屈倾吐给娘家人时，却往往和哥嫂不欢而散，他们不理解七巧的处境，无法开解七巧的苦闷，嫂子只能劝说她抽鸦片解闷。出了门，即使是这样的至亲，也在背后嘀咕七巧说话疯疯傻傻，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七巧无论在婆家，娘家都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她的压抑。事实上，在姜家没有分家时，曹七巧并没有什么错，相反，她替姜家生儿育女，战战兢兢地在姜家生活，按理来说应当受到姜家的好好供养，但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娘家没钱，所以她处处被人看不起，而她的苦闷也无人能理解，这也难怪最终曹七巧会压抑疯狂，用金枷伤人伤己。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也是饱受封建压抑的女性，她生活在父母、兄嫂之中，却深感自己无依无靠。因不堪忍受夫家的虐待离婚回了娘家，起初因她有一笔不小的钱财，尚能在哥嫂这里勉强生活，可当她钱财被哥哥哄得花完后，迎接她的就只有无休止的谩骂羞辱。哥哥要求她回去守丧，过继一个孩子生活，母亲也对此也很赞同，认为唯有此才能在熬上十几年以后，有出头之日。范柳原虽然对白流苏有意，但他不想娶她，只是每日约她游玩，用舆论破坏流苏的名声，再加上流苏回家后家人们那“杀了她还怕污了刀”的态度，流言碎语逼迫她陷入绝境不得不重回香港，接受他的包养。正如流苏所言，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才是最痛苦的成分。即使是那曾经敢离婚的流苏也受到家庭的如斯压迫，更别提那些一辈子循规蹈矩的女性更是被怎样束缚。

《创世纪》中的紫微也是深受封建家族压抑的女性。父亲嘱咐女仆：如遇兵匪乱事，无论如何先把小姐结果了“不能让她活着丢我的人！”⁷她不但不觉得这种做法有错，反而认为她自己遇到该死的时候会主动求死，这样叮嘱女仆的做法反而是父亲看轻她，认为她不懂事。

⁶ 孟悦，戴锦华著.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7.第6页。

⁷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257页。

婚后，丈夫不成器，爱玩，不干正事，还时常出去嫖赌，但紫薇却因为丈夫多年来没有讨姨太太而觉得宽慰。紫薇爱看戏，文明戏火的时候她天天坐在包厢里看戏，却被亲戚朋友背后指指点点说闲话质疑她同戏子偷情，紫薇知道后生生将自己气的生病，这样的层层压抑将紫薇捆绑起来。

透过张爱玲的书写我们也能看出这些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封建礼教家庭中的生存实相，这些被封建家族深深压抑的女性无一不是血泪满满。而这源自于封建家族的层层压抑又使得原本就不完美的女性心态变得更加畸形、疯狂、病态，形成恶性循环。

（二）对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反思

一直到今天，张爱玲的女性塑造依旧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原因就是张爱玲对于女性人格弱点、精神缺陷的揭示，包括：女性无法逃脱的权力、金钱、情欲的诱惑；女性对于同性的虐杀和报复；以及深深扎根在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

1. 权力、金钱、情欲的诱惑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选择做富商的姨太太，养婢女帮她笼络上流社会。梁太太本也是封建家庭养出来的女儿，良好的家庭能够为她寻找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但是她却为了追求富足的生活，自愿嫁给粤东富商梁季藤做第四房姨太太，为此不惜和生养自己的封建家庭，手足至亲闹翻。在封建家族的思想观念中给人做小是一件自甘下贱的勾当，败坏门风。可是梁太太并不在意那些，从她在婚姻上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清醒的女人，她并不掩饰自己对于物欲的追求、对于金钱和富足生活，奢侈生活方式的追求。

而文中的葛薇龙同样是一个抵不住金钱情欲诱惑的女性，她从住进梁宅看到衣橱里金翠辉煌的衣服开始一件件试穿，就意识到自己和“长三堂子”的人没有区别，但她还是住了下来。之后更是参加各种酒会、聚会、文艺沙龙、周末派对，见识遍了奢华的上流社会，早已忘记自己留在香港的初心是为了“求学”，她意识到“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一个有钱的，同时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⁸沉沦在了物欲之中，但令她最为不舍的却还是情欲，对乔琪乔的情欲使得葛薇龙决定要将自己的色相作为挣钱的资本养活她的爱情。

《金锁记》中曹七巧也是一位用自己年轻健康的身体换来金钱的可怜女性。因为贪图姜家的富贵，她嫁给了瘫痪在床的姜家二少爷，只能陪伴着那具“没有生命的肉体”。她用青春换来金钱，压抑了自己的情欲，但她同样是渴望情爱的，她在姜家时便对健康强壮的姜季泽有意，向他哭诉“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⁹。甚至在分家后姜季泽来寻找她时，她也陷入浓情蜜意，认为自己“嫁到姜家来，是为了遇见姜季泽，命中注定要与他相爱”¹⁰，但当她意识到姜季泽是来诓骗自己的钱后，又立刻暴跳如雷地动手打他，整个人在金钱与情欲中反复挣扎。

2. 女性对于同性的虐杀和敌视

千百年来，女性明明已经遭受到了男权的无情压迫，但当女性拥有部分的男性权力时，她们又毫不留情地作为封建男权的代言人行使权力摧残女性，此外，女性为了争夺男性的互相敌视也是值得反思的，正如宋剑华所说“女性早已不再是同一利益的社会群体，而是为了

⁸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31页。

⁹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94页。

¹⁰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03页。

获得男性‘安全’呵护的情敌或仇人”¹¹，这种对同性的排斥更容易让女性自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明知女性的艰难，自己也曾是受害者，但还是在有钱以后成为摧残女性的角色。她利用自己的经济，笼络一批年轻女孩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出去交际、笼络上层阶级，维系自己奢侈享乐的生活。同时，梁太太也很清楚如何利用女性的弱点来攻击对方：对于睇睇的忤逆不顺，她吩咐其母押睇睇下乡嫁人；为了哄着葛薇龙替她应酬，她用和乔琪乔的婚姻绑住葛薇龙，同时许诺乔琪乔可以很轻易利用葛薇龙的不贞洁结束这段婚姻。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年轻时受到婆婆姜老太太和妯娌的轻视作践，本是深深的受害者，但当她拥有了一家之主的权威时，却果断地将刀转向自己的儿媳身上。她刚见面就对儿媳充满讥讽挖苦，频频用言语羞辱这位年轻而活力的女性，直羞地她无地自容。曹七巧与儿子彻夜畅谈这对新人的闺房密事，带着身边的所有人以夫妻二人的闺房之事取乐调笑。逼得儿媳芝寿年轻早夭，甚至连儿子身边的姨太太都忍受不住七巧的变态宁愿吞生鸦片自杀。同样的，曹七巧在折磨摧残自己女儿上同样十分熟练。七巧的脚是缠过的，平日里也是塞棉花装的文明脚，可她却硬要为长安缠足。长安得了痢疾，七巧也不为她延医请药，反而让她抽鸦片缓解，使得长安也染上鸦片瘾。长安背着七巧与童世舫相识，定亲，眼看着长安就要幸福出嫁，但是七巧却从中作梗，将童世舫约到家里，展现家中养姨太太，女儿抽鸦片的丑态，生生破坏掉女儿所有的希望。

此外，还有《十八春》中的顾曼璐，为了挽回丈夫、保住她的婚姻，她将魔爪伸向自己的亲妹妹，帮助丈夫强奸妹妹，囚禁她在自己家，生生断送自己妹妹的幸福。《小艾》中的姨太太忆妃，在知道小艾被成孕后，她没有去找自己的丈夫五老爷要说法，反而将自己的全部愤怒倾洒向同是女人的小艾，对小艾疯狂地毆踢，打骂，小艾被她打的生生流产。

3. 扎根在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

封建宗法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本就不合理，但女性甘愿配合封建礼教的压迫成为被封建家庭驯服的奴隶，则是更为可悲的事情。由于封建礼教的一遍遍洗礼，对于一切压迫的顺从成了扎根在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使得这些女性在家庭中遇到所有的无理要求或者窘迫境遇都能平静的接受。

《等》中的那一群太太们，每天念叨诉说着各自丈夫能良心发现、回心转意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生母冯碧落，她虽曾与言子夜相爱，却听从父命嫁给了聂介臣。虽然身不由己，虽然郁郁寡欢，却也就低眉顺眼地屈伏在丈夫的统治之下，竟从来没有表示过主动的抗争。《十八春》中的顾曼璐，明知道丈夫是个流氓，喜欢寻欢作乐，却还是在丈夫透露出对自己的妹妹有想法后，不顾妹妹的意愿将其送上丈夫的床。《小艾》中的五太太，一辈子没有与五老爷生活过太长时间，五老爷整日里在外和姨太太生活，但她仍愿意替五老爷养护前妻留下的子嗣，为五老爷的交际应酬变卖嫁妆，无怨无悔。

张爱玲用作品向人们揭示出，女性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自身的人格弱点，精神缺陷，也是导致女性生存艰难的重要因素。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展示产生的影响不啻于鲁迅的《阿Q正传》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暴露。

¹¹ 宋剑华. “金锁”未必是“金钱”——论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自省意识[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85页。

三、展现都市女性的失落之地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都市女性生活在这个宗法制度根深蒂固，新旧过渡社会中所面临的经济、婚姻的独立困境。早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就曾借睨儿之口表达过女性求职的一些现实的窘境“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样呢？姑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事也有，一个月五六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竟受外国尼姑的气，真犯不着！”¹²葛薇龙当初要留在香港便是因为不想半途而废，想要尽快毕业拿到文凭，但是睨儿的话却敲醒了葛薇龙，即使读到大学也不是很容易找事做，更何况葛薇龙家中也是中产之家，她也是从小娇养，拿着微薄薪水不仅很难养活自己，而且处处受气。

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又何尝不是一位思想先进有主见的女性呢，在原先门当户对的家族婚姻中受到欺负，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甚至在他死后也不去奔丧主孝，这在那个时间流逝比外在慢的白公馆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白流苏的勇敢可见一斑。白流苏的钱被兄长们花完后开始受到兄嫂们的指桑骂槐的讥讽，她深知白家再也住不下去，即使这样勇敢有主见的女性，在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却依旧要用自己的前途搏一段婚姻来作为保障。范柳原有钱又有闲，是个风流极了的人物，其实与白流苏的前夫不遑多让，甚至与前一段婚姻相比，流苏的处境更糟，因为范柳原不想愿意受到婚姻的束缚，不愿给流苏婚姻的保障。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对于经济不能独立的流苏来说却是别无选择中的最好选择，唯有范柳原，能够帮她脱离现在的经济、家庭窘境。

《年青的时候》中的沁西亚也是一位受过较好教育的女性，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很窘，所以将自己的工作安排的十分紧凑，白天在怡通洋行工作，晚上又做语言专修学校的德文助教。但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美好的女性依旧要“为结婚而结婚”，甚至在婚后还要需要做一些零散的兼职来贴补自己的零用钱。还有《十八春》中，顾曼桢也是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大姐出嫁后，她每天做三份工尚且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还需要母亲从出嫁的曼璐哪里时不时拿一部分金钱来贴补娘家。

都市女性因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而她们拥有从家庭中走出的能力，她们试图自己养活自己脱离家庭的束缚，但是在张爱玲笔下却将都市女性们在不利于女性谋生的宗法过渡社会中的经济、婚姻窘境展现的一清二楚，这些思想先进，教育良好的女性只是短暂的走出家庭，最终还是回到家庭的怀抱。

张爱玲对于女性自身的剖白不仅注重展现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女性饱受压迫的一面，更不忘展现都市女性的在经济、婚姻上的无助和无奈，再加上对女性自身精神缺陷的反思，也使得女性形象更加完整立体起来。

结语

张爱玲对于女性建构的第一步就是对于男权的刻意消解，通过描写自私虚伪的父亲、丈夫，让男性话语在本文中逐渐消失来消解父权，并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塑造出一批封建女性大家长来代行父权实现对于男权的解构。此外，张爱玲不仅找到了被封建家族压抑的女性，体现出封建家族中女性的生存悲剧，更重要的是她也对女性自身的精神缺陷进行了反思，这样深深的叩问是具有极深的自省的价值和意义。最后，在张爱玲的笔下，更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失落之地，都市女性比在封建家族中受苦的女性要幸福许多，她们有机会利用自

¹² 金宏达，于青编. 张爱玲文集 第2卷.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8页。

身良好的学养从家庭中逃出，可是她们具有工作的能力，却没有工作的机会；她们具有工作的机会，却无法养活自己和家庭，只能作为“女结婚员”再次投向封建家庭，依靠封建男权的供给，这些对女性自身的剖白也使得张爱玲的女性建构超越了时代，更具有长久的人性反思色彩。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著. 张爱玲文集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07.
- [2] 孟悦，戴锦华著. 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07.
- [3] 刘思谦著. “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2.
- [4] 郑悦. 叩问女性命运：从鲁迅到张爱玲[D]. 河北大学，2005.
- [5] 林幸谦.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J]. 社会科学战线，1998(02)：78-91.
- [6] 林幸谦. 反父权体制的祭典——张爱玲小说论[J]. 文学评论，1998(04)：34-42.
- [7] 严三九. 谈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内审意识[J]. 社会科学家，1996(06)：56-61.
- [8] 宋剑华. “金锁”未必是“金钱”——论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自省意识[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3)：85-89.

The female construction in Zhang Ailing 's works

Zhu Li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As an active female writer since the 1940 s, Zhang Ailing 's women have unique imprints of the times and trag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emale construction in Zhang Ailing 's works from two aspects : deconstructing male authority and dissecting women themselves. It also sees that Zhang Ailing not only exposes the hardships and oppressions of women 's life, but also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women themselves, reflecting her keen judgment and human nature as a female writer.

Keywords: Male power; Female construction ; Zhang Ailing

作者简介：朱琳，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